

匈牙利悲剧

〔匈〕山多尔·科帕奇 著

龚新康 译



381
E31
824

匈牙利悲剧

山多尔·科帕奇 著
龚 新 康 译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匈 牙 利 悲 剧

山多尔·科帕奇 著

龚 新 康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丹 阳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267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江苏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44 定价:1.00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山多尔·科帕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匈牙利抵抗游击队，匈牙利解放后，他转入内务部警察系统工作，一九五二——一九五六年任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他因支持纳吉而被选进党的政治局，事件失败后被捕入狱。一九五八年，由于卡达尔向赫鲁晓夫求情，他才免于死，被判无期徒刑。一九七五年他获释出狱，一九七八年移居加拿大，一九七九年发表本书。作者在书中以自己的特殊身分和亲身经历记述了匈牙利事件爆发的背景、事件经过、苏联出兵情况、作者的狱中生活以及一九五八年纳吉案的审判情况，为纳吉之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本书资料丰富，对了解和研究苏联在匈牙利事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如何对匈牙利进行控制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是根据西德德意志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德文版译出。

目 录

“记忆”将军·····	(1)
安德罗波夫和“布达佩斯之夜”·····	(15)
“你干得早,结束得也高!”·····	(25)
在拉科西手下·····	(35)
“你们是无辜的,但是·····”·····	(40)
在拘留营的领导机构中·····	(49)
警察局长和上校·····	(61)
古怪的多哈尼中校·····	(68)
“斯大林死了,没关系!”·····	(75)
“你穿上这身制服并不好看·····”·····	(82)
伊姆雷·纳吉和亚诺什·卡达尔·····	(92)
铁托的报复·····	(104)
从示威到暴动·····	(121)
意外的恶性事件·····	(139)
“内战!·····”·····	(155)
站在木椅子上·····	(175)

“内务部行动”	(193)
“干下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212)
再见，美梦！	(223)
向议会进发	(237)
“人多得如丛生杂草”	(255)
指骨嶙峋的人	(266)
我的头不足以	(279)
谢洛夫将军的决定	(293)
一位“不宜露面”的囚犯被杀害	(306)
在迷宫中	(318)
“您作为证人出庭！”	(332)
“以工人阶级的名义”	(351)
七年的黑暗生活	(372)
“上帝带来的”	(379)
匈牙利暴动大事记	(391)

“记 忆” 将 军

一九七五年春，据布达佩斯各报发表的塔斯社电讯称，苏联力主速速召开赫尔辛基国际会议。

也就是说，世界巨头们要会晤。所有西方政治家们在他们的讲话中都着重强调了人权问题、人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等。

我妻子放下报纸说：

“你是不是再去试一下。”

“试什么？”

我沉思着。对过去的回忆日夜萦绕在我的脑际，要摆脱它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难道你不能找一个有影响的、主张撤销你的刑事处罚的人帮帮忙吗？也许现在正是时机……”

作为布达佩斯暴动的军事首领之一，法庭曾判我无期徒刑。几年后，由于一项大赦令，我被释放出狱，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重获公民权。我的档案材料中始终写着“无期徒刑”的字样。在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这种人事档案不正是要求人们时刻都警惕这个人，否则自己就会有被特务们送进监狱去的危险吗？这对一位前警察局局长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啊！

我是一个满师的旋工（这也是我父亲和祖父的职业）。在

我被释放出狱后，我青年时期的朋友们费尽心机把我安置在首都城郊的一家小工厂做工，当局是同意的。后来，我结束了我在被监禁之前就已开始的法学院学业并作了毕业论文，论文的评语为“优”。但是，当局对此却不予理会。在补习班中，我又获得了“企业法律顾问”的头衔，可当局不允许我从事这种职业。

光阴荏苒，当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苏联“古拉格”^①的总头目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把我投入监狱时，我才是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上校。而今，我已年近百岁，但却是一个学非所用的学者和前囚犯。我希望有朝一日能从事司法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申请又被退了回来，申请书上划了很多红道道并用粗体字写了一个批语：

拒 绝

我失望地去求教法学院院长。

“您对我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您完全有权从事司法工作。至于对您的处罚，在大赦宣布后就应该取消了。这个‘拒绝’有什么根据吗？”

“没有任何根据。”

“什么！这是不可能的！每一拒绝必须列举理由。”

这位院长还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他严肃地摇摇头。

“我将尽力为您解决这件闻所未闻的怪事。”

① “古拉格”为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俄文缩写的音译，后被泛指为强劳集中营的代名词了。——译者注

一天早晨上班前，我妻子把我推到电话机旁。

“你现在就和米哈伊约好！”

米哈伊是司法部长，是我早年的朋友，我已十五年没有见到他了。

“难道你不知道，他会接见我吗？此人是不是一位当年的患难兄弟有任何来往的。”

“你还是试一下吧！行不行再说。”

还是我妻子说得对。谈话很顺利地约定了下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去了部里。这是一幢巨大而又华丽的巴罗克式建筑物，查士提提亚^①的塑像从楼顶上向下俯视。

秘书在走廊中迎接我。

“是山多尔·科帕奇吗？请您跟我来。部长同志在等候您。”

部长在他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微笑着欢迎我。

“山多尔！见到你太好了。你家里好吗？”

“谢谢，还好。”

他请秘书拿来了咖啡。他和我一样，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生在布达佩斯，而我生在北方。以前我们并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朋友关系。我们是在学习期间认识的，一起上过法学课，那时我是首都的警察局长，他是党中央的一位军队负责人。在结业后，或许是通过考试后，他还曾到我家去吃过饭，我妻子是一位杰出的厨师。

“伊波尔娅在做什么？”他问。

^① 查士提提亚是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译者注

“她有工作……”

“孩子呢？你们的孩子是个姑娘，对吗？”

“是的，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了，最近已结婚，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加拿大。”

沉默了一会儿后，我就把话题转向我的来意。

他的脸部立即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他把目光转向一侧。

“我想和你好好谈谈，山多尔。我同意你的第一个撤销刑事处分的申请。但使我极为惊奇的是，申请却遭到了国家主席团的拒绝。采取这样的否决态度，这还是第一次。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已无法再斡旋下去了。”

“但是人们不能不给我生活的权利！我已获释！”

“这我当然知道……”

“你至少要告诉我，我的申请为什么会遭到拒绝。为了取得职业，我要知道法律原因。”

他看着我。

他拿起一枝笔和一个笔记本，然后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去找这个地址。我确实很遗憾，山多尔，我只能做到此。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

这是司法大楼二层楼五十一号房间。一位年轻的女公务员已等候我多时了。

“是山多尔·科帕奇吗？我们已得到您来访的通知。请随我来吧！”

她从钥匙串上挑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我们走进一间空荡的办公室。她从钥匙串上又找了一个钥匙，打开了

第二个门并开了灯。这是一间狭小的无窗房间，中间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迅速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墙和门都是铁制的。

“请坐。您可以阅读一下有关您的材料。”

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本薄薄的宗卷夹，然后把它打开放到我面前。这里面有一张写着铅笔字的纸，纸上有用橡皮擦过的痕迹，旁边又加进了几句话，字迹潦草。

纸上主要写着各种文件的名称、材料类别、日期和登记号等。纸的中央写有几行字，象是一条批语：“凡原判为无期徒刑者，不予免刑。”

我好象在做梦。

“小姐？”

“有什么事？”

“这上面所写的东西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为什么？”

“我的徒刑已改为十五年了。徒刑是十五年。上面所写的已经失效了。”

她毫无反应地听着我说。

“我只是档案局的工作人员。”

“我可以拿走这份文件吗？”

“不行。”

“那么我请求一份影印件。”

“我们没有影印机。”

“我可以作笔记吗？”

“这是禁止的。”

她看了一下表，时间到了。她把这张纸放进卷宗，然后

把卷宗放回抽屉。我们走出房间后，她又把钥匙在铁门的锁孔里转了三圈。

我象个木头人似地、昏昏沉沉地在大街上走着。当局拒绝了我的申请并将其拒绝的理由加以保密。他们不让我获得他们非法行为的任何一点点证据。匈牙利政府出于缓和政策的需要已较长时间不再对暴动的参加者进行迫害了。有两位这件大案子的幸存者已开始安稳地从事他们的职业。

我忽然恍然大悟：当局现在是左右为难。它本不愿意放我出狱，但是由于一个强大的政权（苏联）出于某种需要而施加了压力，又不得不这样做。为了达到永远控制我的目的，有关部门瞒着政府违法地做下了这些手脚。

我因病八天没去上班。我和妻子经过一番苦思苦想后觉得。这种事除了保安机关外别人是干不出来的。早在我被囚禁期间他们就多次想要我的性命。

他们从未想过我能死里逃生。他们在法庭上曾要置我于死地，并很有把握地认为，我逃脱不了上断头台的命运。如果不是卡达尔（当今匈牙利的国家首脑）亲自向赫鲁晓夫要求的话，也许我早已和纳吉总理及马勒特尔国防部长一起不在人世了。（我至今还内疚地认为，第三个受害者，即那位很有才干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基麦什，很可能是为了凑满所要求的数字而代替我走上断头台的……）

情报部……保安部……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摆脱这只大黑鼠和这条多瑙河的大黑鱼呢？

我在绝望中决定去请求我父亲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他

在国家机构中担任很高的职务，当然，他并不是最高当权者。

自从我上次见到他以来，他未见苍老。那是在我父亲的国葬时，也是在我被释放出狱的那天。他和专程前来吊唁抵抗战士老科帕奇的几位身穿便衣的苏联达官贵人一起站在灵柩的另一边。这位朋友偷偷地观察着我（是由于我父亲，还是我的原因？也许两者皆有之）。

“你好，山多尔！我听说，你希望重获选举权。”

我说，更重要的原因是保安部不放过我。

“来，我们一起走吧！”

他往通向花园的门那儿示意了一下。就连这位超脱任何嫌疑的人也不愿在隔墙有耳的地方谈话。

“山多尔，我们的情报部门对你的案子无能为力。我已了解过了，你的材料毫无痕迹地从档案中失踪了。”

我象被当头打了一棒。这位朋友要求我镇静地在他的身旁散步。

“你听说过有一个外号叫‘记忆’的人吗？很可能是此人拿走了你的材料。”

我认识他。在内务部里，我们曾给伊什钦科将军——苏联情报部的一位高级军官——起了这个诨名。早在我任职期间，他就把匈牙利的所有领导人的材料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如果是他占据了我的材料，这就意味着俄国人不准备彻底饶恕我，我随时都会被枪决或被送进“古拉格”。我向我的朋友表明了这一想法。

他同情地看着我。

“可怜的山多尔，你显然没有继承你父亲的现实主义思

想。时代变了，‘记忆’已不再管这些琐事了，他已成了大人物，人们要听他的。如果他对你的案子感兴趣的话，那么就是说，苏联人仍想掌握你，以备后用。”

接着，他着重指出了我在暴动中的作用。莫斯科是要我这样一个党的前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唯一幸存者、曾与前总理共患难的同志，在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为它服务。

“外交上的变化是不可逆料的。如现实生活中曾发生过的那样，象你这样的人很可能被提升到国家的要职上去。”

我沉默着，他问我为什么不说话。

“您知道，我从未对您谈过……我父亲是在我出狱的前一天晚上去世的。七年中，他未敢再见一见我。他觉得心中有愧，觉得他对我身遭不幸是有责任的，因为曾是他敦促我参加的工人运动……对我来说，他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爱的人。如果您的猜测是对的话，那么不能再失去时间了。重新上台对我已没有吸引力了。对我来说，除了今天下午离开您以后一切都告结束外，我别无他求。”

他默默地、头也不抬地继续往前走着，听不清他在嘀咕些什么。

“结束一切？”

他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不久前他曾去莫斯科旅行了一次。他说，勃列日涅夫迫不及待地期望他所创议的赫尔辛基会议获得成功。

“这也许是一扇门……是你能够出国的一个小孔……”

他还说，索尔仁尼琴曾谈到，莫斯科打算把他们这些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驱逐到西方去。这些将被驱逐的人中没有一位是军人，即使对那位活动频繁、使莫斯科极其讨厌的格

里戈连科将军^①，他们也宁愿把他监禁在疯人院里，而不愿放他出国。但是一旦时机成熟，他又不坐失良机的话，也许……

“对于出国的尝试你肯冒什么风险吗？”

我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我的女儿在加拿大等我们。我不愿把自己的命运再交付给这个控制着我们的政权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另外，你千万不要对任何其他人谈起今天的事！”

一天深夜，有人打来电话。我睡意朦胧地拿起听筒。

“请替我向约日什的孙女问好！”

电话里喀哒响了一声，似乎挂上了。

约日什是我父亲的名字约瑟夫的爱称。他的孙女是我在加拿大的女儿。

我推醒我的妻子。

“伊波尔娅，你听！我们也许不久就能见到女儿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在我提交了出国申请书后，我立即失去了现有的职位。企业法官是个好老头，他必须签署一份有关我违反了劳动权利的规定，因此将被毫无补偿地开除出厂的声明。他表示拒绝。后来他心脏病发作，一直未愈。

^① 格里戈连科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年七十三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苏军总参谋长，一九七七年流亡国外，现合家居住在美国。——译者注

下一个困难是在加拿大领事馆。这位领事保证不了他的国家会给一个象我这样在政治上如此出丑的人物提供避难权。

“我不能向您保证……我要查问一下……然后您再来……”

我第一次去加拿大领事馆就足以使匈牙利保安部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对面的楼房里撤空了整整一层楼（在那里和外国人合谋进行外汇走私的高级娼妓几个月前都已被捕）。

第二天就搬来了新住户，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动静。然而，只要我们一外出，就会有两个男子或是一男一女跟踪我们。他们要搞些什么名堂呢？我和妻子出去散步的目的只是为了使我们的谈话不至于被窃听（在警察局里，我们称这种窃听器为“臭虫”）。我们散步归来，这些影子也就自动解散了。这些可怜的“小鸡子”（我们就这样称呼他们）显得很笨拙，如果在我当警察局长的时候，手下要是有这么拙劣的人员的话，我早就会被撤职了（现在倒好，我不必去操这份心了）。

五、六天以后，我被一辆家具车撞过一次，这辆车撞断了便道边上的铁链并撞着我的肩膀，要不是伊波尔娅及时抓住我，我也许早就死于非命了。

“喂，你们这些人不能小心点吗？”

车内无一人伸出脑袋，这辆车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它倒退出便道后就扬长而去。

第二天，我们刚出门又发生了同样的事。这一次我很警觉。我一步跳离了危险区。这辆车撞倒了房前的一排垃圾桶，然后就开走了。

我们立即匆匆回屋并拉上了窗帘。会有两次偶然吗？是

否企图谋杀？我们决定，我不能再外出了。我们给所有的朋友都打了电话，说明我们要进行绝食，直至我们的出国申请获得批准为止。

两天以后，门铃响了。来访者向我妻子解释说，他受内务部长的委托来通知我，护照司司长要立即找我谈话。

“您给我什么保证，不扣留我的丈夫？”

“‘扣留’？夫人，您怎么会想到这个词的！”

“我要提醒您：如果我丈夫两小时之内不返回，那么只要加拿大方面来电话，你们就将陷入困境。西方报纸将揭露这一切情况，而您和您的领导们也将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啊呀，夫人——”

“不要‘啊呀，夫人’！请您把我的话逐字逐句转告部长——要考虑考虑你们本身的利益！”

在护照司，部长的私人秘书接待了我。他是一位相貌英俊、皮肤黝黑、举止彬彬有礼的青年男子。

“科帕奇同志，”——自我被监禁以来，还从未听到有人这么称呼过我——“我向您传达两件事，一件好的，一件不好的。先讲不好的：您的出国申请不能批准，因为这是不现实的。再讲好的：我们告诉您，科帕奇同志，我们侵害了您的权利，这是事实，我们承认我们做得不对。从明天起，我们将向您提供一个和您的资格相称的职位。”

我感到有些突然。

“这就是说，你们现在打算从我的档案中抽去有关材料了，里面将再也不会有关于我的刑事处罚的记录了，你们可以把这些材料交给我了，是这样吗？”